

民国军阀史略

刘志超
胡玉海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小 引

当我们回顾中国近代历史时，都感到民国时期是最为混乱的时期。1916年至1928年的12年间，政府首脑更换了9次，每人平均在位不到16个月；内阁改组24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任期最长的也只有17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

政权更迭如此频繁的原因，是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军阀政治。先是北洋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和地盘，使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1926年至1928年间，北伐军与北洋军阀又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国民党统一全国后，接着又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间的连年战争。直到1931年初，国内军阀混战才基本停息。在近20年间，从未停止过军阀混战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然而，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因此，对“军阀”研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作为历史知识，这段历史上出现的军阀政治，也常常为人们所淡化。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才以“军阀”为题写成这本书。虽然不能因编写此书而弥补上面的不足，但我们算是尽力了。

本书是两人合作完成的。一至八由胡玉海执笔，九至十六由刘志超执笔。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定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是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8年1月18日

目 录

一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1
	北洋军阀的形成	1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	5
	危急中清廷起用袁世凯	8
	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11
二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16
	袁世凯在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16
	内阁的更易和党派的分合	19
	震动全国的政治阴谋血案	23
	武力“统一”与“二次革命”	26
	军阀专制独裁统治的深化	30
三	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垮台	35
	封建专制势力的猖獗	35
	内忧外患帝制运动的推迟	38
	盗用“民意”实行帝制	42
	人民反对帝制及护国战争爆发	46
	“洪宪”帝制的失败	49
四	北洋军阀集团的分化	53
	黎元洪就任大总统	53
	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	56
	激烈的府院之争	59

	张勋复辟及其失败	64
五	北洋派内部矛盾的激化	69
	段祺瑞的卖国独裁政策	69
	南北议和的谈判	72
	直皖两派矛盾的加深	75
	直皖战争及皖系的衰败	78
六	第一次直奉战争	82
	直奉联合控制北京政府	82
	直奉两派矛盾的激化	85
	直奉大战 奉军不堪一击	89
	张作霖宣布“联省自治”	94
七	南北政府的对峙	99
	南方军阀的内部纷争	99
	南北两总统被逐下台	102
	北京的无政府状态	105
	孙中山再组大元帅府	108
	曹锟公开贿选总统	111
八	第二次直奉战争	115
	奉系大力整军经武	115
	奉粤皖反直三角同盟	119
	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与江浙战争	122
	奉直大战 血染长城	125
	北京政变和直奉战争结束	130
九	直系失败后的临时政府	135
	段祺瑞重掌政权	135
	段政府的善后会议	138
	奉军巧夺东南地盘	141
	孙传芳兴师驱逐奉军	144

郭松龄举兵驱张	147
直奉军阀的联合	153
十 北伐战争的发动	157
统一广东的战争	157
国民革命军广州誓师	160
直驱两湖 平定东南	163
十一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168
张、吴北京会谈	168
奉张控制下的北京	171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174
张、吴、阎“三角讨赤联盟”解体	177
十二 三个对立的反动政权	182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182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185
张作霖重整小朝廷	189
武汉政府走向反动	193
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	198
宁汉战争和宁粤对立	202
十三 新旧军阀的最后较量	206
蒋介石东山再起	206
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	211
奉军出关与京津换旗	215
皇姑屯事件	218
张学良锐志易帜	223
十四 内战连绵的 1929 年	228
裁兵引起的纷争	228
蒋介石伐桂战争	232
蒋阎冯的三角斗争	237

十五 蒋阎冯桂的中原大战	242
反蒋联合阵线的组成	242
中原战场上的鏖战	245
扩大会议召开与北平政府的成立	247
东北军入关	251
扩大会议的彻底破产	254
十六 第二次反蒋联盟的起落	258
国民会议与蒋胡之争	258
广州非常会议与广州政府	262
蒋汪合流与非常会议解体	267

一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北洋军阀的形成

北洋派军阀的创立者是袁世凯。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流浪失意，后投淮军统领吴长庆，充庆军营务外帮办。

1882年，朝鲜汉城发生“兵变”，袁世凯随吴长庆统兵入朝，协助朝鲜国王镇压兵变。当时，清军入朝有“散入村家作弊”者，袁自告奋勇担当整顿军纪的任务。一次，袁向吴报告说：所带军队之中有抢掠朝鲜村庄鱼肉鸡鸭蔬菜之事。袁尚未说完，吴即厉声责问：“我已给你令箭，你为什么不严办？”袁忙答：“我当时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现在七个首级在此呈验。”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为将门之子。”当时军中有人对袁杀人媚上不满，作诗讽刺说：“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也正因为袁如此表现，才受到吴长庆和朝鲜国王的赏识。1885年，袁以“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留驻朝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袁多次写信请求李鸿章调他回国，最后竟以病重“惟有死”相哀求。7月17日，袁奉调回国。回国后，袁再也不愿做营务处的差使，到处活动新差使。

甲午中日战争中，旧式清军一败涂地，这使清朝统治者痛

感：“练兵为第一大政”。于是在1894年冬，清政府命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招募丁壮，训练新军，名为“定武军”。袁世凯也是改练新军的积极鼓吹者，在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时，他在天津就上书李鸿藻，侈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他说：“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在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这封上书果真发挥了作用，不久，李鸿藻就推荐袁世凯去接办定武军。

袁世凯肩负着皇帝给他的练兵重任，于1895年12月21日到达小站，接管定武军。袁世凯为了增强“新军”的战斗力，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营规和军纪，规定士兵每年给假3个月，如遇征调，必须待征调结束后休假。平素必须“谨守法度”，凡临阵退缩、交头接耳、诈病不前、遇差逃亡、以及结盟立会、造谣惑众、持械斗殴、聚众哄闹、惊叫乱伍者，一律斩首。

袁世凯懂得要牢固地控制士兵，单有严刑峻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精神上麻痹士兵，从物质满足士兵。于是，袁世凯革除了旧式军队中“饷簿”和克扣军饷的陈规陋习，实行“厚饷”，士兵每月给饷4两5钱，头目5两以上。发饷时由饷局直接发给兵丁，不许他人插手。袁还针对“兵丁多不识字”的特点，颁发“训词”，炮制种种口诀和歌谣，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让兵丁背诵，并时常考问，使士兵一个个地都变成维护封建地主统治的卫士。

袁世凯为了培植自己的军阀势力，加紧对新军的控制。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他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然而，在选拔将弁方面，他又仍然因袭湘淮军

阔的旧习。袁通过吸收义子门生、拜把兄弟、结亲等封建习俗，和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手段，网罗和培植党羽，先后把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拉入新军，委以重任。又将原定武军将领段芝贵、曹锟、卢永祥 and 湘淮军旧部张勋、田玉中、孟恩远等拉拢过来，加以重用。这些人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为袁控制新军，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奠定了实力基础。

由于袁世凯主持练兵特别卖力，受到清廷的好评，声誉也隆隆而上。1897年7月，清廷为奖赏袁世凯，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随后不久，袁世凯又因出卖君主立宪派，取得了西太后的信任。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变法维新的“上谕”。在这前后，光绪帝提拔了一批汉族青年担任大政。因此，由于新旧之争进而牵涉到民族偏见。满族权贵们在极度恐慌的情况下，想抬出西太后来压倒光绪帝，他们到西太后面前诉苦说：“皇帝喜用汉人，我们都快站脚不住了。”除此外，还搬弄许多是非，西太后听了非常生气。她决定在9月份借到天津阅兵之机，当场扣留光绪帝，另立一个幼君，以便于自己再临朝听政。

光绪帝得知这个密谋后，想通过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名京卿加以挽救。谭嗣同错误地把袁世凯当作新党同志，他便冒冒失失地于半夜去见袁，叫他带兵到天津先杀荣禄，然后进京包围颐和园，再把西太后软禁起来，以解救光绪帝被废的危机。并保证事成之后升任他为直隶总督，以酬其功。

此时，袁在太后与皇帝间、旧党与新党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听了谭嗣同的计划后表示要认真考虑。第二天，他找到他的智囊尹铭绶秘密商讨后，匆匆赶到天津面见荣禄，把

新党的这一计划如实告发。结果，第二天就发生了西太后再临朝听政，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新党被镇压。新政中途夭折，袁世凯备受清廷信任。

1899年，山东爆发义和团运动，受到打击的帝国主义分子，点名要袁世凯带领“新建陆军”去镇压义和团。在帝国主义的保举下，袁世凯一跃而为山东巡抚，开始对山东义和团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戮。袁在镇压义和团的时候心狠手毒，而对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扮演了侵略中国急先锋角色的传教士却倍加庇护。为了讨好于帝国主义分子，他把被义和团焚毁的教堂、教所一个个重新修复，对教士、教民，一个个抚恤，给他们树碑立传。他曾多次告诫部下，“如遇洋兵来境，务仍优礼接”，深恐开罪帝国主义，他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个忠实代理人。

袁世凯以极其残忍的手段镇压了山东义和团，博得了中外主子的一阵喝彩，从此官运亨通，步步高升。1901年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率军浩浩荡荡又回到直隶。一回到直隶便大力扩充武装，进一步扩张个人的军阀势力。1902年，他大量招募“新练军”，取名“北洋常备军”，“北洋军”名称自此始。

袁世凯一面训练北洋新军，还一面创办巡警。除此外，他还身兼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等要职。他利用这些要职又谋取了很大的经济权利，这又奠定了其军阀集团势力的经济基础。

自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最终形成。袁世凯的爪牙已布于吏、户、兵、工四部，并不断向各省扩张。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对人民实行最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人民毫无政治权利可言，这一国情就决定了中国人民反抗反动势力“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

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武装斗争，把武装夺取政权规定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从1894年底“兴中会”创立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就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有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0年的惠州起义，1907年的黄冈起义和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之役和镇南关之役，1908年的云南河口之役，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清政府对新军十分疑虑，不断在新军搜捕“不稳分子”，撤换了许多形迹可疑的军官。正是由于清政府自己感到恐怖，就用恐怖政策对付全国人民，在各地遍布鹰犬，想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因此，全国人民越来越感到与清政府势不两立，只有推翻这个政府，才能生活下去。

在同盟会开展对于改良派的批判斗争和多次武装起义的影响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也日益高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各地。

这时，群众的反抗斗争主要表现为饥民暴动、抗捐抗税和保路运动。如从1907年至1910年，长江下游和两湖一带不断发生大规模的抢米事件。1910年4月，长沙城乡饥民2万人聚集在巡抚衙门门前，要求减价平糶米谷救命。面对饥民，湖南巡抚岑春煊竟下令开枪，当场死伤数十人。饥民愤不欲生，与

清军展开激烈搏斗，进而捣毁抚署，砸抢米店，焚烧教堂和洋行，把长沙城闹得天翻地覆，反抗的烈火越来越旺。清政府一面调集军队前来镇压，一面将岑春煊撤职，并允许开仓平粜，以平息饥民的怒火。同年5月，为反抗政府滥增捐税，山东莱阳农民揭竿而起，数千人冲进县城，包围县署，焚毁巡警局房屋。6月间，万余农民再次涌进县城内。山东巡抚急忙调集北洋军前往镇压，屠杀农民数百人，焚烧民房千余间。

清政府的镇压政策，使人民大众与清政府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1910年前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国呈现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景象。

1911年10月10日，在革命时机成熟的基础上，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它打响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

虽说武昌起义是在革命时机成熟的基础上发动的，但起义的具体行动还是很仓促的。原来，在武汉的革命秘密团体日知会、共进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决定于10月6日举旗起义，但因准备不足，又改期为10月16日起义。到10月9日，汉口的革命机关遭到破坏，这时，大家又传说革命党的秘密名册已被官方搜获，就要按图索骥。大家担心到时一个攀扯一个，不但真革命党要被杀头，就是一般士兵也将要遭到同归于尽的命运。于是，人心慌慌，莫衷一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文学社社长、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决定当晚12时提前起义。正当他们在指挥部部署起义计划时，军警赶来搜捕，蒋乘隙逃脱，有三人惨遭杀害。于是，武汉全城戒严，清朝当局大肆搜捕，形势顿时紧张。革命党人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缺乏领导，群龙无首的劣势下，毅然决定仍按原定计划举行起义，“谓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与甚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犹可冀死中求活。”10日晚7时，工程第八营总代表熊秉坤等首先发难，击毙了反动军官，鸣枪为

号，举行起义，并很快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各营、队纷纷响应，云集楚望台。守台的队官吴兆麟响应起义，大家就推举他为革命军的临时总指挥。

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后，即兵分三路攻打督署。瑞澂吓得心惊胆战，仓皇出逃，革命军占领督署，光复武昌。11、12日，汉阳、汉口先后光复。

11日上午，武汉各界人士在谘议局召开大会，选举革命军鄂军都督。当时，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或在国外或在上海，文学社、共进会首领亦均出逃在外。起义士兵和下级军官们缺乏建立政权的经验，把筹建政权之事交给谘议局的耆绅父老们。结果推举原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汤化龙为民政部长，由革命派、旧军官和立宪派联合组成了起义后的第一个革命政权。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字宋卿。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1883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后入湖北新军，任管带、统带、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在10月10日武昌起义时，曾负隅顽抗，后又匆忙逃走，躲藏在黄土坡谢国超管带的家里。他派回去取行李的伙夫，被找他的人发现，威逼着伙夫把躲藏地点说出来，并由伙夫引路到谢家。黎听见门外嘈杂的人声，又匆忙地躲在后室的床后，但终于被迎接他的人搜查。当来人说明已选举他为都督时，他拒绝说：“你们的人才很多。你们不要来找我，我干不了这件大事。”

经人们再三劝说，黎同意随来人一起到谘议局，到谘议局后虽然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但仍说：“你们不要抬举我，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最后强迫其就任都督职，并代为签发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第一张布告。革命党人一投足，就走错了这第一步，为以后各省和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开了一个妥协的头，也潜伏下了更大的隐患。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震动了全国，最先起来响应的是湖南、陕西。

湖南是富于革命传统的省区，在武昌起义前，湖南的革命运动日趋高涨。两湖革命党人曾相约：若湖南首义，湖北立即响应；若湖北首先发动，湖南即日跟上。可是，当湖南巡抚余诚格当天得到消息后，将新军调离长沙，革命党人3天后才知道武昌起义的消息，故未及时跟上，直到10月22日才乘机起义，光复长沙，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推举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

在湖南光复的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联合会党、刀客举行起义，光复西安，建立了陕西军政府，推举张凤翔、钱鼎为正副都督，并出兵潼关，从腹背威胁清政府。

紧接着湖南、陕西之后，宣布独立的省区是江西。江西的独立，更加巩固了武汉革命军的地位，并且推动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进一步的发展。

10月31日，云南宣布独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11月3日，上海起义，推举陈其美为沪军都督。11月4日，浙江新军起义，推举汤寿潜为浙江都督。11月5日，苏州新军起义，拥立程德全为江苏都督。至11月下旬，全国24行省，已有14省和上海光复独立。未独立的省份也都如火如荼，革命洪流汹涌澎湃。

危急中清廷起用袁世凯

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各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以领导全国的斗争，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12月25日，长期在海外组织革命斗争的孙中山回到上海，他那崇高的威望和影响，赢得了人民的普遍尊敬，12月29日，被各省代

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庄严宣布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各省代表又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各部总、次长和局长名单。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标志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初步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大胜利成果。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革命势力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震荡着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危急中急忙起用袁世凯，企图靠他来镇压革命，延缓清王朝的统治。

袁世凯在1909年被清廷免职，在彰德等待时机。1903年，袁世凯向清政府建议成立京畿督练新军处，并极力推举庆亲王奕劻为督练新军大臣，自己退居会办大臣。这是他既要扩充私人武力又要避免皇族疑忌的一个策略。结果清政府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钻进了圈套。到1904年以前，北洋军已经成立了一二三三镇，1905年又成立了四五六三镇。由于北洋军扩得太快，袁的兵权太重，尽管他善于运用满族亲贵作掩护，但最终还是引起了一部分满族亲贵的疑忌。

1908年11月，作为新政偶像的光绪帝和保守派巨魁西太后相继死去。清廷立三岁的溥仪继承帝位，年号宣统，由其父载沣（光绪帝兄弟）摄政。载沣摄政后，一些王室亲贵极力鼓动他杀袁，以报袁出卖维新变法，以致光绪帝被黜之仇。后在重臣奕劻和张之洞的劝阻下，免他一死。于1909年1月，以“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为名，而被开缺下台。

袁世凯下台后，回河南彰德购建一所“养寿园”，每天披蓑戴笠，莳弄花草，表面上似乎寄情于山水之间，而实际上他一时也没有停止过政治活动。他曾吟诗一首：“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首诗充分表达了

他不甘寂寞，待机而动的野心。

袁世凯期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革命党人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惊恐万状。由于革命军方面没有海军，陆军方面的兵力也远不及政府军。因此，清政府虽然很惊恐，但还自认为扑灭革命军没有问题，但是要扑灭革命军又必须依靠北洋军。然而，北洋军是袁世凯的旧部，受命指挥北洋军南下的荫昌指挥不灵，行动十分缓慢。冯国璋的第五镇组成第二军，是南下征讨的主力，而冯在接受命令的当天，秘密去了涇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教给他“慢慢走，等着瞧”的六字要诀。荫昌见势头不对，也留在北京没有动身。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清政府束手无策。在这极为严重的局势面前，中外反动派都心照不宣，深感前途暗淡，一致要求起用袁世凯。袁世凯本人也决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他通过徐世昌转奏向清政府建议起用他“讨伐叛军”。他的私党也乘机大造舆论“非袁莫属”。美国的侵略分子司戴德也煽动说：“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摄政王载沣是个昏庸胆小的人，为了迅速扑灭革命军，他被迫于10月14日起用袁世凯，发表了“湖广总督着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的上谕，并要袁迅速督师南下。

袁世凯对这道命令并不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在下上一道谕旨的当天，又下了一道上谕，规定袁世凯“节制调遣”“所有该省军队既各路援军”，而对“荫昌、萨镇冰所带水路陆各军”，只能“会同调遣”。这就是说在指挥北洋军上，袁世凯只能充当荫昌的副手。袁在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就断定自己会出山，可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名义出来最稳妥、最有利呢？这是他反复考虑的问题。因此，他使用“足疾未痊”的理由辞谢这个任命。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患过什么足疾。“以前载沣硬派他患有足疾叫他退職养病，他现在就根据这句话作为拒

绝受命的理由。”这是他故意延宕，以提高他的出山价码。

曾经保荐过袁的奕劻心里暗暗纳闷，要我保荐你，现在谕旨已下，为什么又不肯授命呢？他叫徐世昌到彰德去探实情。徐回来后便以袁的名义向清廷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宽容武汉起事人物、授以指挥军队全权、保证供给充足的军费等6项条件。正当袁世凯与清廷讨价还价，相持不下之际，武汉革命军攻克了刘家庙，光复湖北大部，接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廷眼看就要葬身于革命的火海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清廷不得不接受袁的全部条件，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袁的要求得到满足，革命形势又迅速发展，不能再拖了，他于11月6日出山，对革命进行疯狂镇压。

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集团的支持下，袁世凯夺取了清朝的政治、军事大权。他一上台，就南下督促北洋军向革命军疯狂进攻。11月27日攻下汉阳，在龟山上架起大炮猛轰武昌，炮声隆隆，昼夜不停。可是，只是隔江炮击，并没有渡江攻占武昌。袁世凯这样作其目的是明显的，一是利用优势的军事力量，暂时保存清政府，以逼迫革命党人向他就范；二是他深深懂得“养寇自重”的道理，以利用革命军来威胁清政府。因此，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他都留有余地。

早在袁世凯正式出山之前，他就曾策划和平攻势消弭革命的阴谋。在北洋军攻占汉口后，袁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一面叫刘承恩再次致书黎元洪，提出君主立宪，早日和平了结。黎回信拒绝君主立宪，但明确表示如他赞助共和，当推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